

朱斐居士訪談錄（一）*

卓遵宏、侯坤宏訪問，周維朋記錄**



朱斐居士六歲時與母親合影

一、上海佛教淨業社的初次佛緣

我開始接觸佛教是在青少年的時候，那時才十幾歲。我曾參加上海佛教

青年會，這是全國唯一的佛教青年的居士團體，會長是方子藩居士。那裡經常舉辦講經，我就利用假日去參加活動，其中有法師或居士的講座，有誦經或念佛的法會等等。我從佛音廣播電台獲悉一個講金剛經的消息，地點在上海赫德路（今改為常德路）的佛教淨業社，那也是一個居士團體，禮請圓瑛大法師宣講《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日期正



十四歲時的朱斐居士

* 本文係卓遵宏及侯坤宏纂修於民國95（2006）年9月6、7日在臺中菩提仁愛之家訪問朱斐居士之訪談稿。朱斐居士，字時英，民國10（1921）年出生於蘇州，曾東渡日本，入長崎高等商業學校攻讀，擅長日文。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加入佛教青年會，參加佛教活動，先後皈依於靈巖山印光大師、慈航法師。37（1948）年渡海來臺，擔任省立臺中圖書館總務部主任，在職期間，受慈航法師之託，主編《覺群》（後易名為《覺生》），標示「宏揚淨土法門，建設人間佛教」宗旨。41（1952）年12月另行創辦《菩提樹》月刊，並辭去公職，專心編務，直到78（1989）年12月由淨行法師接辦為止，前後歷經37年。朱斐居士目前雖已退休，仍不斷從事文字與口頭上之弘法利生事業，以達其以居士身分貢獻佛教的願望。本文所刊圖片由朱斐居士提供。

** 卓遵宏現為國史館退休纂修，侯坤宏現任國史館纂修，周維朋曾任國史館助理。

好是學校放暑假的期間，我就如期前往聽經。法師講大座，儀式很莊嚴隆重，法師身穿黃色大袍，披搭大紅袈裟，據說是祖衣。那時我才16歲，印象中已記不起講經法師的尊號，一直誤以為是能海大法師，直到近年中我拜閱了沈居士去疾兄編的《圓瑛法師年譜》時，翻到圓老法師的行止中，在淨業社於暑假期間講金剛經的記載，才確定正是圓瑛長老。上海佛教淨業社，那是個很大的居士團體。在家居士如關綱之、王一亭、黃涵之等，都是當時創建該社的發起人。淨業社的社址又名「覺園」，占地很大，大殿以外尚有大講堂、密壇、念佛堂、圖書室、出版社等，還有佛音電台，那是全國佛教有廣播電台的第一家。在戰後初期臺灣一直都沒有佛教電台，早期想要辦的人也沒有辦成。現在連電視台都有了。

二、我的三次皈依

我在上海的時候，初聽圓瑛法師講《金剛經》，當時年輕，似懂非懂，雖然不懂，我還是聽了一個暑假，聽完一部經。那時候我還沒有皈依，因為皈依要先報名，報名要繳付兩毛小洋，那時上海通用的有大洋、小洋，那是民國二十幾年的事。因為當時還是孩子，家裡不給錢，我就沒有辦法參加皈依，只

好很羨慕地觀看著別人的皈依大典。

後來他們皈依好了，法師就下座離去，連法席上擺的佛像都還沒有收去；這時我忽然靈機一動，看到院子裡有一個身穿百衲僧服的和尚，年紀大約六十多歲，穿得破破爛爛，手裡揮著蒲扇，有點類似濟公。他每天都來聽經，但是，他不是坐在大殿的椅子上，而是盤著雙腿坐在院子裡的大石凳上聽經。我就懷疑這個老和尚，不曉得是不是可以為人說皈依？就走過去合起雙掌問了一個訊，然後請教他，我說：「師父！你是不是會幫人皈依呢？」似乎有點看不起他嘛。他也不開口，只點點頭。我說：「要不要錢？」他搖搖頭，我說：「我可以請你替我皈依嗎？」他又點點頭。我說好啊！我那時候隨身正帶著一枝毛筆，我有一個盒子，裡面裝毛筆，兩段式的那種毛筆，套起來，打開墨盒，隨手拿一張報紙，請他寫在上面，他幫我取了法名叫「維寶」，就命我跪在院子裡的石板上接受皈依，跪著有點痛，夏天穿的單衣褲嘛！他叫我怎麼念，我就怎麼念，我當時念了些什麼也不知道。後來才明白都是些皈依三寶的文字。

我也沒有問師父住在哪裡，後來打聽，他是住在法租界的法藏寺，我也

曾到法藏寺去問師父的去向，他們說他是個行走十方的僧人，不是常住在那裡的，只在這裡掛單。我沒辦法找到他的去處，連他的法號，我也記不得了。當時只寫下我的法名「維寶」兩個字，叫我要維護三寶吧！

我那時就喜歡動動筆頭，年輕時我就在報紙上寫些短篇散文，也許就是後來當主編的前因吧。我記得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素食，因為我在皈依後就開始吃素，才16、7歲，家裡人不知道我吃素，這篇文章東抄西摘湊合而成，居然能在報紙的副刊上發表出來，我高興得不得了。

後來我才知道我的故鄉蘇州城內穿心街報國寺，就住有一位大德高僧，因為在上海皈依的師父無法親近，也不能請益，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那時我仍有機會在上海尋覓到他，但接著抗戰爆發，蘇州淪陷了。報國寺的高僧就是淨土宗的一代祖師印光大師。抗戰興起後他老人家就從報國寺上了靈巖山，其實我的家就在滄浪亭附近的烏鵲橋滾繡坊，從平橋直街一直去到王廢基公共體育場左彎就是穿心街（再過去就是護龍街了）。可是印光大師在報國寺閉關時，我還在小學時代，也不知如何去親近大德呀。



印光祖師德相

印光大師到了山上，我從上海寫信給印光大師，還寄了一張照片去，告訴他我的情形，請問他是不是可以為我皈依？他馬上回一封信給我，附寄了一包書。他說他已經老了，不能夠多寫，以後就不要來信了；可是我去信，他還是照覆，老人家慈悲就是這樣。我皈依印光大師，他給我取的法名是「宗善」，鼓勵我要靠自己主動親近善知識，不主動的話，就會失掉機會。寫信給他的人很多，可惜我在戰亂中，把師父的這幾封回信和皈依牒都丟失了。

我在民國37年來臺灣。我最早在臺中的省立圖書館當總務，又接觸到佛教。有一次到臺北出差，訪問臺北圖書館，借住在南昌街十普寺，那時白聖

長老還沒有來臺，裡面的住持是一位帶髮修行的女眾，她的兒子在我的圖書館工作。所以我借住她那裡，素食比較方便，我每次去臺北就住在那裡。

第二天要走的時候，她說：「今天有個南洋來的法師，你要不要看看他？」又告訴我：「他要到我們寺裡來講演。」我說很好啊。他們要去火車站接他，他從基隆上岸，坐火車到臺北。我說這個機會不可失去，就跟他們一起去了，在臺北火車站的貴賓招待室等了一會，接他一同到十普寺，聽他講演。

他就是慈航法師，穿著南傳僧服偏袒右肩的黃袈裟，與我國北傳僧服不同。他講的話是帶有閩北口音的普通國語，用黑板又寫又畫的，講的佛法深入淺出，也很容易懂，由曾普信居士譯臺語。我很高興，可以說法喜充滿。在場的聽眾都是本省人，只有我是唯一的外省人。

法師講完下來以後，跟我握握手，我感覺手好像觸了電一樣，他親切地對我說：「你有空到我那裡來，我在中壢圓光寺，他們要我來辦佛學院。」我說好啊！就這樣答應了。後來在同一年陰曆的12月初7，我就專程到中壢，第二天是初8佛成道日。

那時候去圓光寺很不方便，到了中壢車站後，還要從車站坐台車才能到圓光寺，大約要半小時。台車是一種輕便有小軌道簡便的交通工具。在幾塊木板上置放幾個木椅、用人力推跑的座車。收費低廉，否則步行可能要一個小時吧。第二天早上，慈航法師給我說三皈依。同時還有毫縣黃臚初老將軍，就是後來的律航法師，那時候他還沒有出家，要求受五戒，我跟他一同跪在佛前，一起接受皈依。

圓光寺住持妙果老和尚，在我們皈依後，就對眾宣布說：基隆來了一個法師，在基隆登陸後就病倒了，因為單身一個人，沒有醫藥費治病，希望在座的居士們發心，隨力布施功德無量！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臺南的弘法健將慧峰法師。

慈航法師給我取了法名叫「慈福」，他為徒弟取名，都是以「慈」字為首。

三、編輯佛教雜誌

為什麼我會去編雜誌呢？原因有點複雜，我當時對佛法還是初學，還不甚懂，皈依也不是一定要懂佛法，許多佛經都看不懂，怎麼能編佛刊呢？

前面提到，我總共有三個法名：1/維寶、2/宗善、3/慈福。我的生日是5

月13日，正與佛教的護法伽藍菩薩——關公的聖誕同一天。也許這第一個法名就是要我維護三寶，其次要種善根，再其次要種福德，而阿彌陀經裡不是有一句經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嗎？我將三位法師給的法名連接起來，就不謀而合、可為我一生中的座右銘。

印光老法師是通信皈依而未能親近，他後來在民國29年夏曆11月初4日往生於靈巖關房，始終未見一面。總算我在臺灣又皈依了慈航老法師，我就常常去親近就教。

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法師，後來臺灣發生僧難，法師亦不幸同遭牢獄之災，雖經好多立委國代等有力弟子為他保釋，但他說：「要出去，就與我的學僧一同出去！」如學僧不可以保釋的話，他就陪他們在拘留所內同聲念佛。這是非常感人的事，最後終於真相大白，法師就帶著這幾個青年學僧在汐止山上興建彌勒內院共修同住，還不斷地為他們講課。即使後來閉了關，也照常關房內為學僧們開課教學。

慈老在汐止內院的時候，我常常去那裡，我與慧心舉行佛化婚禮的時候，他還作了一副賀聯，同時還要青年學僧們也各作賀聯為我們祝福，在我當時主

編的《覺生》月刊上發表。我在婚前的中秋節去看師父時，他還給我一盒素月餅，說：「帶給你未婚妻吃！」老人家就是這樣的親切慈悲啊。

最有意思的是，我負責編雜誌以後，缺少《太虛大師全集》前面的四本，慈航法師聽說我缺書，就從書架上把前面四本拿下來給我。我缺的書有了，但他卻缺了。我說：「那不行啊！你給我，你就沒有了！」他說：「沒關係，我再找，從香港寄來。」老人這麼慷慨、捨得，真是了不起！

我之所以與佛教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就是在一次慈老環島弘法，來到臺中時，駐錫在寶覺寺。在這個弘法大會之前，寶覺寺辦了一本雜誌，叫《覺群》，這本雜誌是由一位大陸來的大同法師辦的。

大同法師也因為受當時臺灣的僧難影響，和其他大陸來的出家法師都一樣不敢出門，雖然事情發生在新竹北部，但整個北部的法師都躲起來。像東初法師、成一法師都換了衣服，成一法師是中醫師，也易服替人看病。

大同法師離臺前曾到省立臺中圖書館來看我。他說：「我想離開臺灣，你看好不好？」他跟我商量，因為常常見

面，我勸他不要走：「你不要出來就是了，度過這個關口就好了。」但是他過兩天就走了。大同法師姓徐，那時身分證都是寫的，不是印的，大同的「大」字上面加一劃，變成「徐天同」，這樣子換個名字出去，他回香港，後來還俗了。還俗也很好啊，他著作很多，關於道教、佛教、哲學方面的書，寫了不少。他在臺中的時候，常常跟寶覺寺的住持林錦東一起到彰化去弘法，他們在火車上發傳單，還講佛法，大同法師用國語講，林錦東翻譯成臺語，這樣的弘法是史無前例的。

他擔心有關當局誤會他，因為這種弘法動作在當時有點超乎常情。其實我都知道，他弘的都是佛法，沒有什麼，我曾跟他一起到彰化員林寺去。這是朱文科的爸爸朱淮光居士主持的佛寺，當時我也在那裡講話。朱文科現在負責彰化員林寺及臺北光華寺，也很熱心弘法工作。

大同法師走了，他辦的《覺群》無人主編就停辦了。慈老在臺中時跟我說：「現在有一本《覺群》雜誌停下來很可惜！想請你接此刊物為他們主編，怎麼樣？經費由寶覺寺負責。」雖然《覺群》只是單張的，算不上是雜誌，只有八開大小，不是個大本期刊。我說

我從來沒有編過雜誌，我在圖書館是做總務，總務的事情比較雜一點，我說時間沒問題，抽得出空來，但是我沒有經驗，我不是學這行的。

那時李炳南居士也在場，他也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我在大陸沒見過李老師，我跟李老師第一次見面就在寶覺寺。慈老說：「李炳南老居士可以幫你寫稿，我那些學生也可以幫你寫稿。」經費的問題，寶覺寺可以負責，但沒有稿源，雜誌是辦不起來的！我沒有把握，便不肯隨便說辦就辦。

我為此事去請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師一聽我也是皈依印光大師的弟子，他就稱我「師兄」，我說我這個皈依是最晚的一期，「宗」字輩都是最後的弟子，李老師是「德」字輩的，他法名是「德明」，比我早很多。

這樣子弄得我騎虎難下，師父考慮的這麼周到，安排好要我接手，我就說：「好吧！我接下來試試看，編得起來就辦，編不起來就另請高明，可以嗎？」他說可以，沒關係，辦一期也好，辦不下去也沒關係。這樣子我才與佛教刊物正式接觸，開始著手編輯。那時候編輯也不是太難，教界消息方面由李老師等人提供，其他則再找幾篇文章

就好了。

我們的《覺群》月刊，標立的宗旨是「弘揚淨土法門，建設人間佛教」，前者我與炳老都修淨土，而《覺群》原是太虛大師在滬創辦，而太虛大師是提倡人間佛教的，所以我們定下這兩者兼具的刊旨，原以為已萬無一失。辦了幾期以後，問題發生了，因為這個《覺群》是太虛大師在上海創刊的，在臺灣有幾個太虛大師的學生，提出了異議，認為太虛大師提人間（生）佛教，怎麼可以加上「弘揚淨土法門」的內容，不合太虛大師的宗旨，他們說不能再沿用。

我跟李老師商量一下，說：「那我們不要辦好了，要辦就換個名字。」把「覺群」換成「覺生」，改個「生」字，群與生一樣嘛，覺群、覺生，都是眾生，覺悟群生嘛！那他們就沒話講了，我們仍以這兩個標題為宗旨，因為我們不能忘本，我們自己學淨土，皈依印光大師，都是修淨土的，自然不能不弘揚淨土。

其實他們也多事，不過我們也遷就，不傷和氣，以後見了面，大家談起來，笑一笑，沒有事。主要那時候還有一個大醒法師，他也是太虛大師的門人，他也反對，「大」字輩的都是太虛大師的弟子。這事處理妥當後，我就開

始在圖書館公餘之暇，當了《覺生》的主編，前後將近三年。不久臺灣省教育廳有一個命令，凡是公教人員不可以兼主編或發行人，省立圖書館屬於教育廳管轄，必須照辦。到底為什麼這時會有這麼一個公文，或許是圖書館館長呈報上去也不一定，不過他沒有講，我也只根據有這個公文來推測而已。

我個性比較倔強，辦佛教雜誌既對大家都有好處，我樂意堅持下去，於是我就辭掉圖書館總務主任的職務。我是薦任級的，不得已、不顧親戚的反對，自己先辭職。

那時候我已經結了婚，我太太支持我，她會裁縫，在家裡開一個縫紉班，找幾個學生，一邊教學、一邊幫人家做衣服。我辦雜誌都沒有領薪水的，算是義工，從此，我是依靠太太的收入來生活的。

為什麼《覺生》辦了不到三年就不繼續辦了呢？不是不辦，我既已辭掉公務員工作，那有不辦的道理；只因為發行人是林錦東，他的宗旨跟我們不一樣，他在外面收錢，收了錢帳目卻不公開了，我跟李老師商量，最後我們決定，李老師先辭掉社長，然後我再跟著辭主編，我們自己再另辦一個雜誌，因為我辦雜誌已經有點經驗了，有讀者，



《菩提樹》創刊號封面

也有作者。那時候的作者，有很多法師幫我們寫，還有很多居士。於是，我們開始辦另一份雜誌，稱做《菩提樹》，意為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我先在《中央日報》花10塊錢登一則分類小廣告，贈送《菩提樹》雜誌。那時佛教刊物不多，因此索閱的人不少，雜誌寄送出去後，更有好多讀者來要，其中就有大陸來臺的老居士，如方倫老居士、高登海、崔玉衡居士等，都是深通佛理、能寫佛法的高手，看到我們的雜誌辦得還可以，他們就主動來投稿。這樣子稿源就暢通了，最初只有慈航老法師和彌勒內院的幾位青年僧如妙峰、印海等法師，為《菩提樹》寫稿，接著在軍中布



與劉國香居士（右）合影

教的煮雲法師也來了稿，星雲法師也來稿了。而前在《覺生》月刊上常賜文稿的南亭老法師和默如老法師等也照舊經常惠稿，因此我們的稿源暢通，甚至有時會發生稿擠，不得不臨時增加頁數的事。

慢慢地雜誌就茁壯起來了，加上很多不認識的居士也紛紛贊助。彼此認識後，就成了好朋友。方倫老居士出身海軍，他學佛都是在軍艦上學的，當軍艦停留在港邊時，他就請勤務兵，上山到一個寺廟，借《大藏經》回來閱讀，他是直接閱讀《大藏經》而學佛的，這是件了不起的事啊，沒人教！他寫的東西都有分量，《禪話與淨話》等，都寫得

很好。

想不到《菩提樹》發刊後一鳴驚人，劉國香居士（筆名圓香）也是我們的主要作者，我們兩人到現在，已變成了好朋友。他為我們每期寫一篇論文，排在首頁。到後來我對他說：「我就留一個版面給你，你每期都撰寫一個版面的佛學論述，到時候一定要寄來，不寄來，我就寫限時信催，再不見稿，就用長途電話催討上門了。」長途電話費用貴，寄限時信有時比較方便，圓香兄看到限時信就會趕快寫。催來的都是有分量、受讀者喜愛的佳作。本來這些文字都是應該由編者自己作的，但我這編者不才，沒有辦法單獨承擔，只有靠大家幫忙。

星雲法師的《無聲息的歌唱》，把佛教中日常所見到的法物及非法物用散文的體裁及各物自語的口氣書寫，在發表的時候分「物語之一」、「物語之二」陸續刊載，「物語」二字在日文中是指「小說」或「故事」的意思，但星雲法師所寫的既不是「小說」也不是「故事」，而是指用物的口氣所講的話，像這種文章，作者要站在「物」的立場上去代它說話，這一系列的文章深受讀者歡迎。煮雲法師的《普陀山異聞錄》在我們的鼓勵、催促下，還沒有刊

完，他發現讀者的熱愛，就趕快自己送印刷廠付印出版了。這樣子《菩提樹》就撐了下來。最受讀者歡迎的是李老師的《佛學問答》。自從慈航法師跟他講了，答應以後，開頭就用問答體裁，自《覺生》開始一直持續到《菩提樹》，沿用了許多年。這是很多讀者愛讀的。

《菩提樹》雜誌前後共發行了37年，出版444期，3個「4」大概不太吉利吧，到那一期為止就停刊了。雜誌結束是因為我內人病了，我內人她對道業很上進，結婚後仍到臺中的靜宜大學夜間部就讀。她是在43歲那年考進夜間部，48歲畢業，前後讀了5年。她在學期間，我就請一個女孩子幫忙辦理雜務，如校對、發行等等，我太太有時也幫忙，就是這樣三個人，合力辦一本雜誌。每一期發行都是邀約附近的蓮友，或中興大學智海佛學社的同學們幫忙。約好時間，就在那一天來包裝雜誌，包裝好了立刻送往郵局。

我們這份雜誌校對認真，不致有大錯，能定期出刊，不太會脫期，因此許多大法師，如演培法師等，都很樂意投稿。校對方面，是我自己負責第三校，第一校請辦事的女孩子對，第二校我太太對，第三校我自己看，還有第四校呢！上了機器還要去看看！上了機

器仍很容易錯，那時候都是鉛字排版，鉛字排好後，如不束緊，便有鬆動的鉛字高低不平，工人常常會拿起來，在鉛字底下敲敲平、磨磨好，再放下去，有時不免放錯了。我一看，初校時都沒有錯，怎麼印出來會是錯的呢？他就告訴我上下左右插錯了，所以每一次上機的時候，都要到印刷廠跑一趟，看看上了機器打印出來的樣子，過程很複雜、麻煩的。

尤其像謝冰瑩這些大作家，字潦草的不得了，好多字都認不出來。只有方倫居士的字跡工整，好像手寫的小楷一樣，畢恭畢正的，每個字都這樣，幾千字都這樣子，方倫老居士海軍出身，做事一絲不苟，其他每一位作者的字體都不同，各如其性。

以前聽人說上海的報館工人本事很大，四面八方來的筆跡都不一樣，他們都不會弄錯，錯的多了要扣工資。這些人只是檢字工人，讀書不多，學問都是檢出來的。來臺灣後的《中央日報》也少有錯誤，但有一次中央的「央」，不曉得怎麼弄錯了，變成中共的「共」，出紕漏出在節骨眼上，麻煩可大了。連校對的人也要受處分。所以校對錯字，我們非常注意的，往往上了機器還是會有錯誤的。

文章印出來沒出差錯，作者也高興，雖然我們不付作者稿費。我們也付不起稿費，但大家都是好朋友，居士、法師都是我們所尊敬的，他願意無酬給你寫稿，已經是看得起你了。因為我們校對認真，這些老法師，你請他寫，他都會寫，印順老法師也有求必應、南亭老法師寫得比較多一點，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他是內蒙古的活佛，是我們的名譽社長，我們也曾請他寫過一篇紀念文字，他是總統府資政，隨身有一位秘書，他口述由秘書寫了寄來，真了不起。每逢週年紀念，我們都請國內外名人政要題字，有的不寫文章，只題字。題字鑄銅版付刊，不會有錯誤。

我主編《覺生》的時候，刊名「覺生」，與司法院長居正先生的字「覺生」相同，所以標題就請居覺生先生題署。我沒見過居院長，是透過善導寺董事長李子寬長者的介紹，有一次在新竹碰到居院長，李子寬就拉著我去見他說：「來來來！這位就是幫你覺刊題署的居院長。」院長的姪兒在內政部，我們申請雜誌的登記，是他姪兒幫忙的，所以很快通過，因為是他負責這方面的業務。我和居院長就只見過一面，後來他在民國40年11月23日無疾往生了。

于右老是你請他寫什麼，他馬上

就寫來，他也信佛啊，後來的監察院長黃尊秋也信佛，以前我們中華佛教居士會跟日本靈友會結盟的時候，李甯會長就請黃院長蒞臨證盟，黃院長好像有點客家口音。于右任的小女兒于念慈和女婿張澄基博士都是佛教徒，他們在美國賓州大學，張教宗教學系的佛學課程，于講授中文。張教授於1988年初夏5月25日安詳往生，享年68歲。于念慈教授於賓大退休後，在住宅附近，集諸蓮友組念佛會，來莊嚴寺邀我去，分多次講《八大人覺經》、《心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等。有高尚、彭英、過九齡、郭愛蓮、龔兆安、郭肖倩等蓮友二十餘位與會，並輪流駕車來莊嚴寺我住的「退而不休寮」來接送。

過去臺灣的許多官夫人，每當週日，都跟著蔣夫人宋美齡去教堂做禮拜，而信了基督教，唯獨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張清揚居士篤信佛教，也有一些信佛的群眾，跟她去佛寺聽經聞法，她自己也會講一些因果和感應的故事，她是一位能說、能行、很有口才的女居士，又樂善好施，慷慨解囊，從不吝嗇不捨。我在編《覺生》的時候，慈航菩薩在臺北十普寺講《八識規矩頌》，孫夫人也在座聽經。那時候我剛開始辦《覺生》，雖然我不管經濟，但慈老很慈悲

地對我說：「下課後到裡面客廳裡坐，我為你介紹見孫夫人。」果然孫夫人也來了，慈老對她說：「我這個徒弟現在在臺中辦一份佛教刊物，你怎樣幫助他？」孫夫人對我說：「你晚上到我家來。」孫公館就在南昌街十普寺附近，通過門衛時我就說：「我跟夫人有約求見！」孫夫人當面給我一張1,000元的支票，那時候1,000塊可以辦一年的雜誌。

孫夫人很端莊，她常常到各地佛寺講佛法，但她也往生了，她是非常信仰觀世音菩薩的，以前她多病，都是觀世音菩薩救回來的。她皈依智光老和尚。智老法師是南亭法師（南老）的師父，與南老同住於濟南路的華嚴蓮社。

智老來臺灣之後，蓮社一切事都是南亭法師負責，智老他不管事，南老是他的得意徒弟。有一次我到臺北華嚴蓮社看智老法師，他知道我要創辦《菩提樹》，就將抽屜裡放的一些錢拿給我，很慷慨地說：「統統拿去，給你辦《菩提樹》！」他住在蓮社的後面，華嚴蓮社的素菜很有名，因有名廚主持，是南老從上海帶來的。這個廚師據說臺北所有素食餐廳的廚師，大多是由他教出來的！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但蠻有名的。日月潭的玄奘寺開光的時候，就叫他借涵碧樓舉辦數十桌素筵招待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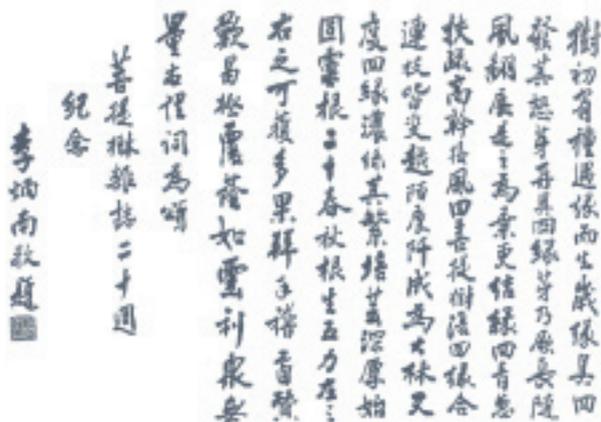
太虛紀念館暨聖蓮室落成留影

各界貴賓。

南老也很慈悲，他後來也到臺中講經說法，曾在臺中佛教會館閉關。李炳南老師只收學生，不收皈依弟子，他把弟子介紹皈依南老。以前大陸還沒有淪陷的時候，四川有一位如岑和尚，早期聽老師講《心經》的學生、蓮友，都由李老師介紹通信皈依如岑法師。後來與我結婚的鄧明香居士，就在那時也由炳公代辦通信皈依了如岑法師，法名「慧心」。

如岑法師也是修淨土的，曾親近過印光老法師。後來兩岸斷絕往來，李老師就只好介紹在臺灣的法師，如懺雲、

南亭、會性、斌宗法師等，印順法師是在捐建了太虛紀念館給菩提救濟院後，才介紹皈依。證蓮法師（證老）來到臺中，授五戒，菩薩戒，就是千人戒會後介紹皈依的。證老在此次千人戒中，他自己不受供養，連隨同來的法師也都不接受，全部拿出來捐給還未成立的慈光育幼院。默如、戒德法師，都是常州天寧寺的，證老是天寧寺的退居方丈，現在戒德法師已將百歲，仍回常州到天寧寺去傳戒，此外，他還常帶著眾戒子雲遊各國名勝古蹟，前歲美國莊嚴寺落成的時候，他也應邀去主持五大師漱口一座呢！



李炳南老師墨寶

四、李炳南老師

李炳南先生在民國38年才到臺中，我早了一年，37年6月就來了。那時候臺中的佛教寺廟只有寶覺寺，也算是最大的，其他的我就知道了。臺北有一間十普寺，那時候十普寺的大小與現在的差不多，現在好像內部增建擴充一點，但老樣子還在，大殿後面就是寮房。那時的信徒都與孫立人夫人有關係，還有一些護法，如當時有名的生生皮鞋店的老闆娘，這些都是白聖法師的皈依弟子。不過臺北的皈依弟子，有的也不只皈依一個法師。

我們臺中一年舉行兩次佛七，早期一次在2月19日觀音菩薩聖誕前七天，一次是11月17日阿彌陀佛聖誕前七天。地點在南區靈山寺，由靈山寺當家師德欽比丘尼主持，領眾念佛。佛七中重要的是止靜以後的開示，每天一次。開示的人，必須要能掌握現場念佛大眾用

功的情形，如果有昏沉、掉舉、鬆懈或過度緊張的情形，都得隨時加以糾正，並指導大眾如何念佛，才能獲得一心不亂，這就必須是念佛法門的行家才能勝任的任務。靈山寺佛七中的開示者，都是由靈山寺聘請雪公李炳南老師擔任。後來因李老師法務忙，靈山寺每年的佛七就只舉辦11月中的一次，參加念佛的大眾都很用功，能獲得「一心」者，都是得力於李老師在佛七中的「開示」。

靈山寺在李老師的影響下，信眾漸多，因大殿較小，就加建了一座念佛堂，並改制成專修淨土的道場。靈山寺是霧峰名紳林獻堂家的家廟，原建在霧峰鄉，後又在臺中市忠孝路城隍廟邊新建一所，住持為德真尼師，初為帶髮修行，後來也圓了頂。她是臺中縣長林鶴年先生的繼母，早年曾與德欽尼師同到福建鼓山受戒，李老師到了臺中後，經立法委員董正之居士介紹，由林獻堂先



李炳南老師在法華寺講經留影

生推薦，開始在靈山寺講經，並開辦佛七法會，主持開示。那時臺中佛教蓮社還沒有成立，後來創建蓮社，李老師被推舉為第一屆的社長。任期屆滿後，李老師功成身退，就擁護德欽尼師出任第二屆社長。

李炳南老師剛來臺灣的時候，先是在居仁路法華寺講經，那時候法華寺是個小廟，由一位有家室的出家人林智雄住持。因李老師是有執照的中醫師，能為人看病，因此借法華寺為人義診。我們要是傷風感冒，四大失調，只要李老師拿張紙條，寫幾味中藥，吃了就好。李老師重視看脈相，幫人看病時，只要按一下脈並學會講一句臺灣話：「舌頭！」看看舌苔就好，除了這句，其他他都不會講，看脈相時，若需要講很多

話就要找人翻譯。當時有一位賴棟樑居士，他是本省籍的中醫師，常幫助他，在旁邊為病人譯語。

後來李老師開始在法華寺講經，第一部講的是《般若心經》，那時候周宣德居士在后里糖廠，離臺中市較近，聞訊後就來聽經，周宣德因此認識李老師。早些時候海峽兩岸還通信，李老師就採通信皈依方式，如有信眾要求皈依，就代介紹皈依四川的如岑法師，皈依證寄來時，就請李老師在佛前代說皈依。後來兩岸通信斷了，就找附近的懺雲法師（懺公），介紹皈依。懺雲法師也是我們常親近的一位戒德莊嚴的法師。

後來南亭法師率隊來臺中宣傳影印《大藏經》以後，便來臺中閉關，所以



與李炳南老師（右）合影於臺中公園

蓮友由李老師介紹皈依南老的也不少。像王炯如等，是皈依南老的。後來會性法師來臺中，印順長老捐建太虛紀念館以後，也有介紹皈依他們的。

李老師替法師代收皈依，都要倒貼紅包，一般本省的信徒都不知道要供養皈依師父，李老師就自己私下拿紅包代學生供養法師。李老師在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先生負責的奉祀官府任主任秘書，空閒時，他曾戲刻一個「孔夫子門前賣文章」的私章。

我以前住在和平街，樓下的小孩子很天真的問我說：「歐吉桑，你們吃菜人有吃飯嗎？」我說：「吃菜，也有吃飯。」他以為吃菜人都只吃菜。我住和平街時，佛教界的海內、外大德到過我那裡的很多，懺公法師和會性法師還在我家榻榻米上養過病，星雲和煮雲法師



慧心居士攝於和平街貼載《菩提樹》之玻璃窗前

也在我家掛過單。我在門口做了一個玻璃框，把每一期《菩提樹》雜誌刊出的畫頁，貼在裡面給來往的路人看，利用機會跟附近的鄰居共結法緣，遷移到國光路後，前兩年我曾回和平街去看過，那座木造的樓房還在那裡，那是以前臺中市長林金標（首任民選市長）侄子林伯廉的房子，租金很便宜。林伯廉住在美國，我曾在美國弗拉盛街上遇過，但他後來往生了，骨灰放在莊嚴寺的千蓮臺，就在我住的「退而不休寮」左側，雖然兩個世界，也是有緣吧！

五、戰後初期所見聞的臺灣僧寶

我剛來臺灣看到臺灣的佛教，除了北部的月眉山、南部的大崗山、中部的獅頭山等寺院，與中國傳統佛教的僧眾一樣外，一般市區寺廟的住持，男眾因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習慣，帶妻食肉者多，女眾則大多剃髮，現比丘尼相。其他如信先天、龍華、金幢的在家齋教寺廟也不少，如臺中的慎齋堂、彰化的曇華堂、嘉義的天龍堂等，但後來都改為寺。其中慎齋堂有兩百年歷史，堂主為張月珠居士。經《臺灣佛教》月刊主編曾普信居士的介紹，我於民國37年到臺中後即去訪問她，這時她擔任臺中市佛教支會理事長。我們都用日語交談，她的日語講得很好。慈航法師第一次來臺中時，負責翻譯的就是她。她還介紹我去后里毘盧寺訪問，她辦事能力強、為人慷慨，頗有女中丈夫的作風。慎齋堂常住的都是帶髮的女眾，對內她給年輕的住眾附設一國語文補習班，對外為了提倡幼稚教育，與市政府合作辦了一個幼兒教育師資培訓所，宜蘭念佛會就派了好幾個女蓮友來接受培訓。當時那裡有一位朱宛仙女居士住在裡面，其子張福慧曾皈依慈航老法師，她也是蘇州人，跟該堂張家有些親戚關係。因為我也姓朱，我借慎齋堂與鄧慧心居士舉行



與印順法師（右）合影

佛化婚禮時，敦請李老師炳公福證，但因沒有親友在臺，原擬請宛仙居士當我的主婚人，後來朱鏡宙老居士來了，就改請朱老居士為主婚人了。朱老居士發現當時臺灣經書很少，法師要講經，找不到經本，就與趙恆惕、李子寬等臺北諸居士共同發起，成立「臺灣印經處」。

從前臺灣女眾出家，都是到福建鼓山受戒，林鶴年的繼母出家時，還在日治時代，一樣到鼓山受大戒，但屬於帶髮修行，不需要剃頭，像前面提到慎齋堂的張月珠，人多稱「月珠姑娘」，後來才由東初法師為她剃度。

智光法師在當時是臺灣佛教界講經人中，出家最久，戒臘最高的，星雲法師把他當做中國僧王，不無道理；但中國沒有這個制度，只是星雲法師恭維他的敬稱，把智老的照片登在他辦的《覺世》雜誌。

現在臺南妙心寺住持傳道法師的師父是開證法師，開證曾將戰後初期臺灣佛教區分為三大主流，其中最大一派就是江蘇派，因為大陸來臺的江蘇出家人很多，名氣也最大，以智光、南亭、東初等領銜。其次是海派，以上海來的僧侶為主，白聖法師為領導，這派後來主導了中國佛教會。第三主流是學者派，以印順法師為首，印順法師研究佛學有很好的成果，受其啟發的後學僧侶，也重視研究佛學。當時大家尊重智光老法師，他在大陸的時候已有很高的地位，來臺灣時年紀已大，並沒有什麼建樹，但是大家都尊老敬賢。南亭法師為智老的弟子，由上海來臺灣，他講的經很多。傳戒是以白聖法師多，當時只有中國佛教會能傳戒，後來其他的每一個道場都可傳戒。戰後初期政府規定每三年只能傳一次戒，因為戒不能濫傳啊，濫傳就會使出家人程度降低。現在好像不只一次了，你也傳，他也傳，任何寺廟都可以傳，所以僧人素質有好也有不好的。南老走了以後，華嚴蓮社就比較保守，現在成一法師把鬍子留起來，法相莊嚴，法師不老不易引人注意，老了就是寶啊！

那時候煮雲法師在后里的五十四醫院，為臺灣日治時代的大地震二十週

年，舉辦一個超荐大法會。我看過一些舊照片，在這次震災中，火車的軌道都被震得彎彎曲曲。他是從普陀山隨軍來臺的軍中布教師，他在后里寫信來，說在次日要為震災罹難者舉行超渡。過去地方上都是拜葷的，現在要提倡拜素食，向懷德佛堂借場地，懷德堂的住持是在家人。我聞訊後覺得這是一次宣揚佛法的好時機，立刻到臺中蓮社，與李老師等商議，當天就趕寫許多宣傳素食拜拜的印刷品，由瑞成印刷廠付印後，次日與許炎墩兄一同雇車送去后里，面交煮雲、星雲等法師，在法會上分送當地參與祭典的居民大眾。

懺雲法師是我最崇拜的一個法師，我繼室葛清筠也去皈依他老人家。懺公到了臺灣，先在高雄大崗山的一個茅蓬修行。我曾在一個暑假裡帶王炯如居士到他那裡去住了幾天，王居士那時仍就讀臺中師範，他是呂佛庭的學生，很會作畫，經佛庭兄介紹後開始為《菩提樹》雜誌畫插圖，後來我們出版的許多畫傳，都是他的作品。他很高興隨我到懺公那裡，在那裡可以聞法、共修，還可以在山上到處寫生。

懺公持律謹嚴，他那裡沒有女眾。原本齋戒學會第一屆舉辦的時候，男女都有，都是大專學生，後來因為裡面有



樓蓮精舍



訪樓蓮精舍與金義楨居士(右)合影

兩個男女結了婚，他們初次見面就是在那裡，等於是在那裡談戀愛，所以後來他山上不住女眾，另在山下租一民房，給參加的女同學住。

六、早期政府對佛教的管理

過去在臺灣講經，只要你有一點知名度就行。當時我跟大陸親友通信，臺灣政府也都知道，偶爾也會來問我：「你什麼時候接到你外甥寫來的信？」雖然是透過香港，我們出去的信還是要被檢查！政府還誤會我們，那時候我的先室在自由路一家補習班念英文，他們以為我太太是香港人，才念得起，不知道她只是一個女裁縫。政府因為這樣子就來調查我，所以我出國的時候很麻煩，總是最後一個被批准。每次出國都是這樣子，不是只有一、兩次而已，第一次當然更不容易了。後來每一次都要

透過關係，護照才能夠順利批准下來。我不加入國民黨，我什麼黨也不參加，星雲法師、淨心法師他們都加入國民黨，白聖法師更是國民黨的忠貞幹部。

在白色恐怖時代，我不算什麼，來調查也沒有關係，儘管去調查好了，不曉得他們是什麼單位來的。其實他們都知道，我在上海有哪些親戚，他們都有名字。他們甚至想利用我跟上海的親戚通信時，問一些他們想知道的話，上海的親戚來信，大部分他們都看到的。我不敢，怕給親戚添麻煩，他們要是給中共當局查出來，就麻煩了，所以我不敢逾越。

七、樓蓮精舍

剛剛辦《菩提樹》的時候，我們還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臺北縣新莊丹鳳里的樂生療養院蓋了佛堂

「棲蓮精舍」。癩瘋病在日治時代叫做癩病，早期醫學上認為這是一種傳染病，由癩瘋桿菌侵入皮膚黏膜及神經末梢而發病，患者毛髮脫落，皮膚發出赤色斑紋，指節潰爛極難治癒。患者老少男女皆有，有的患在臉部，眼皮張不開也閉不起來，患在手足者，就隱蔽患處而不讓其暴露在外。院中有四百多人皆佛教徒，還有一部分是基督徒。

其中有個天主教的神父，在樂生療養院裡頭，利用送奶粉、麵包和放映影片等方式，引誘院民入教，又誇口聲稱要全院基督化，後來他回國度假，等他回療養院時，發現我們為佛教徒蓋了佛堂「棲蓮精舍」，他非常震驚、大失所望！但他們也為患者做了很多事，如專設育嬰堂一所，因院內信教的癩瘋病人中有相愛而結婚的，生了小孩子，他們馬上把嬰兒與產婦隔離，並幫他們扶養，因為嬰兒最易感染細菌。

棲蓮精舍有位金義楨居士，是江蘇常州人，原是軍人，也是癩瘋病患者，他的眼皮都吊起來了，臉部、手足關節潰爛，講話也很困難。我們常常到那裡去慰問、弘法，我曾在那裡講過一些佛法，也講過一部《地藏經》。

過去癩瘋病人集中治療，禁止外出，等於監獄一樣，只許家屬來探視。

因為怕被傳染，有的家人還不敢來探望呢！後來醫藥發達，證明癩瘋病也能治癒，樂生療養院的患者，經治癒而出院回家的人也不少，但有的病人患在臉部，早已面目全非、醜態畢露，受自卑感影響，早已以院為家，也不願回去與家人團聚了。這種病不會傳染，但傳統上認為這是一種傳染病，今雖開放，但患者家人仍不免有些害怕。它的細菌感染多在嬰兒時代，若接觸到患病的人，因抵抗力弱，才會受細菌的侵入，但並不立即發病，潛伏在體內，有的要到長大成人後才發病。金義楨居士前歲曾打電話告訴我，他不久前曾經到日本去訪問過日本的癩瘋病院，是政府幫他辦的，日本人歡迎他。那時候日本當癩瘋病是沒法救治的，他告訴他們臺灣很早就開放的經過。日治時代的樂生院民，就像犯罪的人民，判了無期徒刑一樣失去了自由，今日已恢復自由了。聽說有些國家的癩瘋病院，還有設在孤島上的呢！

金義楨他們想在院區內自力建一佛堂，但非能力所及，就寫信來建議，並寫信求李老師代為呼籲，協助他們蓋一處可以禮佛的佛堂。李老師恰巧到桃園蓮社講經，就有人帶他到樂生院，見到幾百個信佛很虔誠的癩瘋病患者。老師回臺中後，就在我們《菩提樹》的創

刊號上面寫了一篇代為呼籲的文章。這個時候捐款很難，幸而菲律賓有一個僑胞張文斌居士，透過菲律賓普賢學校劉梅生校長的勸說，發心捐了一筆款，再加上我們在《菩提樹》的報導，讀者紛紛捐款，就足夠造佛菩薩金身以及講堂內的各種設備。李老師的登高一呼，也產生了效果，呼籲文中講得很悲痛，很感人的。佛堂就建築起來了，開幕的時候，章嘉大師都去了。最近因捷運新莊線將通過樂生院，說要整個被拆除，問題還沒有解決，捷運要經過是件大事，他們蓮友爭取保留，不曉得問題如何解決？他們如拆掉，將另外找一個地方興建大樓，但只分給棲蓮一間房，連佛像都放不進去。原來的三尊佛像都是我們請臺北廬山軒訂做的，一尊都放不進去，因為新式大樓房都很低，都是有限度的。他們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問我們要不要佛像？三尊西方三聖像比現在任何新式建築都高，加上下面的蓮座豈不是更高了！

我們去棲蓮講經的時候都住在右鄰的迴龍寺，吃飯也在迴龍寺，總是有一點愧疚和顧忌，有的人還不敢去呢，像臺北的唐湘清，他的夫人就不讓他去，後來他知道痲瘋病的傳染途徑，也就經常去了。只管跟痲瘋病人擁抱、握手，

都沒有關係，天主教、耶穌教，都跟他們擁抱的，傳染只有在嬰兒期。所以他們生的小孩只要馬上與母親隔離就可以了，不隔離就很危險。他們裡面有成家的，有的女痲瘋病患者，患處在看不到的地方，臉上一點都看不出是病人，長得也很美；但比較嚴重者，患部往往都在頭面等處，如眼部連眼皮也合不攏，有的是肌肉上抽斷了筋，縮成很可怕的样子。

院裡面有個賴醫師也是佛教徒，我們去時，他都出來接待。所以裡面還有不少人才，施人豪也是個人才，他在病院裡的名字叫施宏毅，曾參加《菩提樹》辦的函授班，從初級到高級都名列第一，後來病癒就去臺北繼續攻讀大學，大學畢業後在臺北金華女中執教。我還到金華去看過他呢。他後來出任中國醫藥學院秘書，並擔任醫王學社指導老師。很多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患過痲瘋病。

八、受菩薩戒與燒戒疤

民國41年臺灣舉行戰後第一次傳四眾大戒，地點在臺南縣白河大仙寺。我們臺中去了四個人求受在家菩薩戒，男的是我和董正之，女的有林看治和我內人鄧明香。當時我內人燙了頭髮，同

戒的其他女眾大部分是齋堂來的，齋堂的女眾都不燙髮的，她們看到我內人燙髮就問：「妳怎麼來受戒，妳燙了頭髮。」我內人說：「我不是齋堂來的，我是在家人，我和先生一同來的。」她們弄不清楚何以在家人也能來受戒？

得戒和尚為大仙寺方丈開參大和尚。戒壇三師禮請焦山智光老法師、金山太滄老和尚和行化華北的道源老法師，尊證有天寧證蓮老和尚、泰州光孝南亭老法師、湛山慧峰法師、普陀煮雲法師等九人。開堂白聖大和尚、陪堂戒德法師。智光長老很慈悲，在三師登比丘壇傳授比丘戒時，九個人一壇，一個晚上就要做完，事實上如果戒子人數多，一個晚上是不夠的，必須增加每壇人數，才能在一個晚上完成。智老和尚很慈悲地對我們說：「你們居士也來登一登壇，通常是不讓在家人登壇的，登壇是只有受比丘戒的才可登壇，但給你們一個機會，作為結緣登壇，將來也好發心出家。」他很關照我們，但後來我們這幾個登過壇的居士，都沒有出家的福報，辜負了老法師的一片好意。

受菩薩戒又叫火燒菩薩頭，出家者必須在頭上燃三顆或十二顆香疤，在家居士則燃在手臂上，以供養佛。我受在家菩薩戒時也供養了十二顆燒在左臂

上。有一次呂正涼師姐的孫女看了問我手臂上怎麼有紅豆冰？後來我在生日的時候，為了報母恩，在右臂上也燒了九個戒疤，是自己做的香頭。香頭必須要用熟香，生的不行，頭要做得尖尖的，下面是圓圓的，尖在上面，在尖頭上點火，就慢慢的往下燒起來，燒到皮膚的時候有一點痛，就趕緊念「南無阿彌陀佛」。受戒時則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有的人因為怕痛，就拚命大聲念，念著念著就不感覺痛了，燒戒疤時每一個人都喊得很大聲。

我內人自己也在右臂上燒了很多戒疤，我打趣地說：「你這裡燒出了一個臺灣省的地圖。」戒疤燒後不能碰到水，但天熱入浴時難免碰到水，一碰水就會發炎，爛成一堆，看起來就像地圖上的臺灣省。

因為從前僧人若無戒疤，人家會以為是冒牌的和尚，現在自由時代不一定要燃香，不過在臺灣出家的人都自願燃香以供佛。大陸則受戒時已沒有這種風氣，但也有主動要燒的人，燒不燒都可以，並不強迫。佛教中更有燃指供佛的，這種古老的方式，在今日已不宜流行了。至於自焚抗議，就太激烈了，這種方式不宜鼓勵。從前印度不但燃指，連頭都可以割掉。我們第二次出國訪

問，本來行程排定要去越南，飛機票都買了，但到了機場，聽說他們的佛教比丘為了不滿吳廷琰總統壓迫佛教而有一人用汽油自焚作為抗議。他們聽說我們要去訪問，希望我們支援，將在我們到達時，再自焚一僧作為歡迎外國佛教徒的響應，「要自焚一個和尚」，把我們嚇了一跳！這麼一來，我們怎麼敢進去，臨時決定不進入市區，只在飛機場停留一下，繼續飛向下一站去了。越南那時候的總統是吳廷琰弟兄兩人，專制霸權又不善治國，最後終因政變而被推翻，逃亡到美國去了。

九、我認識的一些善友

我辦雜誌，常登報要送人。這樣子就結識了很多在家居士，以及出家的法師。劉國香當時在花蓮的醫院療養，那裡有受傷或療養的軍人，他看到這則消息，就來要了雜誌；方倫老居士也是，他住高雄海軍區，他看到了報，也來索取。

因為那個時候其他佛教刊物很少，臺灣只有一份《臺灣佛教》，《人生》是後來才有的，《海潮音》也停刊了。我們《菩提樹》在民國41年才創刊，許多法師有滿肚子高論、佛學，沒有刊物發表，「講經弘法」聞者究竟還是少數人，要多數人接受佛法，需要有佛教的



《佛陀畫傳》封面

刊物，大家都可以方便的閱讀，又可以深入研究。所以，實際上是刊物的影響較大，我個人根本是無德無能，我只不過借這個刊物，結合大家的文才風采，把大家的才華放到雜誌上，這樣子使很多人可以受益。

我們的雜誌內容很通俗，我們出過的書中，第一本就是《釋迦佛陀畫傳》，釋迦牟尼佛的畫傳，內容跟一般的釋迦牟尼傳也不太一樣，我參考一些日本的資料，我在畫傳裡也兼弘揚淨土。作畫的是一位居士，臺中師範學校呂佛庭老師的學生，名叫王炯如。臺中師範學校現在已升等為臺中教育大學。王炯如的畫也是呂佛庭老師教的，他是由呂佛老介紹給我，佛老說：「他可以幫你畫畫插圖。」我覺得很好，他當時還是師範學校的學生，我就找他來蓮社，先介紹他拜李炳南老師為師，李老師是用儒家的一種拜師禮，拜師的人要向老師行個磕頭的大禮，並納贄禮一元紅包一個，執弟子禮。老師把這一塊錢



與李炳南老師（左二）、王炯如（右一）、游俊傑（後）合影於合歡山。

累積起來，還替學生去做功德，實際上他並沒有收你的錢，這也並不是佛家的皈依禮。

我跟王炯如講：「你畫佛像有一個原則，不可用漫畫式的，有失莊嚴，且給一般人的觀感也不佳。」從前要畫佛像，尺寸都有規定，太嚴格也不容易畫，總是要畫得很端正，比人像要豐滿、莊嚴，要讓人家看了肅然起敬，起恭敬心，許多漫畫都是不入流，不端莊，不可以！我又強調說：「這會影響你自己的孩子。」我又引述古代畫馬的趙子昂大師，午睡中在床上思索馬姿而

變成了馬，當他夫人把帳子打開一看，只見一匹馬，四腳朝天，竟將夫人嚇倒床前的故事。這位畫馬的名人，太投入於畫馬的各種姿態，竟在睡夢中「思馬成馬」，那麼你經常畫佛，八識田中盡是佛的種子，豈不也能「畫佛成佛」呢！因畫的是很莊嚴的佛，我又說：「你將來生的子女必定都很莊嚴，很體面。」這些話他很相信，後來他結婚生子，剛剛生出來的小孩子，就很天真、很端正、很好看。我現在在光壽學苑講經時，還常常提出王炯如的例子。他現在已七十多歲了，光壽學苑也是他組織領導並經常為學員講演佛法、帶動念佛淨修的一個淨業單位。炯如的父親是一位書法家，炯如的毛筆字，也寫得很好，他確是一位為人善良、書畫俱佳的居士。

他開始就為《菩提樹》刊畫《釋迦佛陀畫傳》，這是一種有圖畫、有文字說明的連環圖畫，小朋友喜歡看，大人也愛讀，我曾遇到一位年輕的出家人，他說：「我就是看你《菩提樹》上的佛陀畫傳，才信佛出家的。」雖然出家是他自己的志願，但至少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緣。後來王炯如又畫了《虛雲和尚畫傳》、《唐玄奘法師畫傳》、《歷代高僧居士畫傳》等。我要求他根據我寫

的淺顯的文字，每一期作四幅畫，累積起來就成一本書，出版後低價流通，幾塊錢一本，大家買得起，小孩兒喜歡，大人也喜歡。辦雜誌不賺錢，但出書就有了盈餘，作者很慈悲，都不要稿費，我出了書，雜誌社賺了錢，也沒有分給作者，等於都是他們的財、法兩種布施，使雜誌能夠按期出刊、延續維持下去，就是作者的功德啊！

我和名畫家呂佛庭居士，後來也成為好朋友，他的書畫均屬上乘極品，我請他寫什麼他就寫什麼，有求必應。他比我大十歲，亦師亦友。他於2005年往生前出家。佛庭師兄真了不起，他在早期就為拙編的《菩提樹》寫過名山遊記，他後來又為我們畫許多封面、插圖、文字畫等，我出國就把這些作品裱裝後當做禮品，贈送海外的僑團或教友，他們都很欣賞他的字畫。我隨團訪問泰國國王的時候，呂佛庭兄畫了一幅東西橫貫公路的山水畫，我就把它當作訪問團呈贈泰王的禮物之一，因為泰王曾來訪過寶島，見到這幅畫後非常高興，就收藏在泰國皇宮裡。

那時還有一位唐湘清居士，他畢業於昆明雲南大學法律系，曾是一位軍法官，退休後就為人家看病，並任教於中國醫藥學院講授《難經》。該校同學

研究佛學的社團「醫王學社」的社名，就是他命名的。他寫的有關因果報應的故事，文字通俗，我們也請王炯如幫他畫插圖，出版後流通甚廣。還有一位江逸子居士，也是呂佛老的弟子，江居士善工筆人物，也為《菩提樹》作畫不少，如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中品、下品等九品往生圖，做為一年十二期中，每期的彩色封面。我們的封面圖畫或照片，很早就用彩色製作，後來裡面的照片也改用彩色，一般文章的插畫與照片就沒有色彩。而且每一期的圖片說明，都有中、英文的對照，我不懂英文，都是靠幾個朋友幫忙，如新竹的李恆鉞居士，他在新竹工業研究所服務，已在美國往生。許巍文居士，留學德國的博士，今尚健在，目前定居美國德州。後來又有顧法嚴、張澄基等，他們都是擅長中、英文的行家，都曾經幫我翻譯英文。我們還有一個英文版，有關佛教的Newspaper，把上一期的佛教新聞，翻成英文擺在這一期發表，這些都是他們幫忙翻譯的。

顧法嚴跟我也是最好的朋友，他以前在農復會做事，他的本名是顧世淦，退休後闔家遷居美國三藩市，忽發心出家，法號法嚴。但因病終未受具。往生前臥病在床，我到三藩市弘法時，特請

大覺蓮社葉敏、謝冰瑩、甘王鎮芬等諸居士，帶我去醫院看他，他還緊緊地握我的手，表示很歡喜。我回紐約後沒有幾天，就接到噩耗，說他已安詳往生了。他出了家，僅受沙彌戒，幾次要受大戒，都被病所纏。他的中文好，英文也好，巴利文、梵文都懂。顧居士在臺時住在臺北溫州街，他是浙江溫州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St. John's）大學。

他的母親往生前住在天主教的耕莘醫院，我北上去幫她助念時，周宣德居士夫婦已先在助念。他們走了以後，只我一人，陪著顧居士一直念到老夫人安詳往生。往生後應再念八小時，才能送殯儀館，因為潤霞嫂夫人已攜同子女先去了美國，他只有一個人在臺。照醫院的規定是，病人死亡後馬上就要送到太平間去，我對世淦兄說：「你可以跟院方商量，緩一點再送。」天主教比較講得通，因為我們是佛教徒，需要為亡者助念八小時，我們住的是單獨一個人的病房，應該可以繼續助念的，修女護士說：「可以，但你們聲音不要洩露到外面去，以免妨礙人家。」我們給老夫人配了個耳機，插在左耳，同時我們在她右耳邊，輕輕地念佛，繼續念了八個小時，隨後就不必通過太平間，剛好天亮，就直接送往殯儀館。以前臺北只有

一個殯儀館，就是民權東路的第一殯儀館。今日臺灣各大醫院都設有「臨終關懷室」，可隨由各宗教人士助念或祈禱了。

嫂夫人為了小孩子要在美國念書，帶著兒女先去了美國，顧居士一個人住在溫州街，我與內子常去看他，我們感情很好，也因為他幫助我們太多。後來他出國時，我親自送他上飛機。待我有機會到了美國，也曾去舊金山他家裡探望，他高興得不得了。我在他家打電話給另一友人時，友人恰巧是他的一個長輩，後來請他來見面，大家都很高興。後來出家要去住在廟裡，他頗不習慣，就在院子裡加建一間小屋，他就住在那裡，跟家人作一段隔離，他太太和子女則住在裡面的房間。

顧居士本來要求戒的，美國佛光寺開戒時，他先去報名，報好了名卻臨時生病，又不能去，錯過機會，所以受戒也是要有緣，因沒有緣受戒，他始終是老沙彌菩薩，不能成為比丘。他翻譯的文字很多，中、英文都好。當時我就是靠這些居士幫忙。此外像煉油廠的戈本捷居士，起先在左營，後來到嘉義擔任溶劑廠廠長。臺中如有外國人來訪問，要見李老師，沒人翻譯，我就打電話給他，請他從嘉義趕來譯語。

後來又有一位李豪偉（Howard S. Levy）博士，是一個美國人，在臺中華語學校當校長，他是美國人當然通英文，還精通日文、中文、法文，幾國文字都很精通。他後來到日本去了，在日語學校教日文。李豪偉幫我們修改英文裡頭語詞不通順的地方，所以後來幾期的英文稿特別好。我們把李老師的《佛學問答》也翻了一些，都由李豪偉最後修改定稿。我自己不懂英文，要校對才麻煩呢！校對時一樣要認真，英文錯了更麻煩。

我們碰到幾週年慶時，就請這些作者到臺中來，借靈山寺代辦素齋招待他們，中國人、外國人都有，所以要經常跟他們維持感情的，感情一斷就沒有文章寄過來了。不是錢的問題，因為他們不要稿酬。花錢買文稿是後期的事，那些大專學生是要稿費，他們為了錢，東參考西抄錄的，寫出一篇文章也不容易啊。

新加坡辦的刊物，香港辦的刊物，連美國的《美佛慧訊》，都沒有附英文。我說：「我不懂英文，早期都有英文的東西，你們身在美國，怎麼可以沒有英文的東西，都是中文的？」現在《美佛慧訊》也有英文了。臺灣和新加坡、香港的都還沒有啊！現在的圖片，有的不加說明，反正圖片都放在裡頭，

你們自己去看吧！照片裡是什麼人物都沒有交代。這樣子雜誌也有受歡迎的。比較起來我們認真一點，不是馬馬虎虎出版的，每一期出版的稿子都要認真審查。

有一些人拿了一篇稿子來找我：「朱居士，拜託你刊了。」我說：「我還要看看文章好不好。」他說：「沒關係，我供養你，看要多少錢！」他反而要給我稿費！我說：「你文章好，我們就可以登，還給你稿費；文章不好，就沒辦法登。」假如連我都看不懂的文章，就不敢接受。所以我的稿源不會斷，雜誌只要稿源不斷，就有辦法了，可以延續下去，能夠永久延續經營。但最後《菩提樹》還是停刊了，因為我內人生病，患了絕症，我沒有辦法一人獨撐一份雜誌，她往生後，因我缺少了一位得力助手，所以不得不停刊。

十、自立法師與慧律法師

我處世都是隨緣，菲律賓去的次數最多，因為路程較近。慈航法師的學僧自立法師，他跟我感情很好，他的隱秀寺裡有一個太虛講堂，邀請我去為信徒講一些初機佛法，他那裡的信徒也都與我有緣。自從我去了美國以後就比較遠了，不如以前在臺灣的時候，離菲律賓近，可以常常到那裡。

自立法師為人非常好，也很謙虛，他幫助《菩提樹》也很多，他在菲律賓辦了一個《慈航》雜誌，請陳慧劍幫他編輯，在臺灣印，他出錢，然後再送過去。我在那裡寫了一篇〈淨法隨筆〉，後來放進我的文集裡，每期寫三段有關淨土法門的隨筆，一共寫了八十多期，後來他把這些集結起來，出了五本小冊子，都送完了。

我的講演集，大部分是去大專學校佛學社團演講的文稿。慧律法師在高雄辦一個文殊講堂，有一次他到紐約去講演，看到我，就跟大家介紹說：「他是我的啟蒙老師。」說是在他讀逢甲大學的時候，我去演講時認識的，弄得我頗不好意思。他現在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講演，也不容易啊，我看他有一點像慈航老法師的樣子，不曉得是不是慈航菩薩再來的？

十一、太太是我編輯雜誌的得力助手

我內人鄧明香，她是李老師的早期弟子，也是李老師在法華寺講經時，代授皈依四川如岑法師的。她常到鸞堂去聽李老師講經，那裡供奉的是恩主公，就是關公，在臺中路的有明巷，一條小巷子裡頭。李老那時候住自由路新生報

後面的奉祀官府，就在我住的省立臺中圖書館附近，他剛剛來臺灣的時候就住在那邊。有一天他到圖書館來找我說：「這兩天晚上去聽經好嗎？」我不曉得什麼人講經，也沒有問他是誰講，我就跟他去，反正晚上也沒有事。到了那裡，才知道是在一條小巷子裡的一間鸞堂，我太太也是那裡的鸞生，跟她媽媽在那裡拜，他們常通宵的拜，很虔誠，穿著白衣，女性鸞生都是穿白色的旗袍，因此她也來聽李老師講經。

聽完經回來，我們同路的，有李老師，還有第一銀行的經理簡國垣居士。有一天晚上，我們走在路上，她那時候還是鄧小姐，在後面叫：「老師！老師！」我們回頭一看是一個女孩子，就是在鸞堂聽老師講經的，她問老師：「什麼叫一心不亂？」這下子引起老師特別的注意。聽了有問題，可見她平日一定很認真在聽，她問的這個問題蠻深的，李老師跟她解釋一下，此後對她就特別注意。

後來她也在我們圖書館晚間參加國文補習班，等於是我的學生，有一次演講比賽，她也來參加，有點口才。我為評判人之一，還給她打了高分，看這個女孩子很乖，又是虔誠的佛教徒，還在念書。她住在自由路，很聽媽媽的話，

她媽媽早上到媽祖宮燒香，她就去幫忙掃地；媽媽去鸞堂拜拜，她也去鸞堂。在她家裡，媽媽並不吃素，她倒發心吃素，吃素家裡就不贊成。不贊成那怎麼辦呢？她說：「我為報娘恩而吃素。」有的時候家裡飯桌上都是葷菜，她就在白飯裡拌一點醬油，帶著便當去上學了。她在天主教修女的補習班讀書，補習班就在我們自由路新生報社對面，但她帶了便當躲到我們圖書館的兒童室裡吃，不想讓同學們看到，因為便當裡沒有菜，只有醬油拌的飯。偏偏給我看到了，因為我吃過飯，總要到宿舍休息，一定會經過兒童室，我就去看這個小姐在吃什麼？她一看到我，就趕快把飯盒藏起來，不讓我看。我說沒有關係啦，我們都是佛教徒。她就說：「因為我吃素，家裡不贊成，沒有素菜，就拿醬油拌飯。」後來她家裡看她這樣子也不行啊，就每天為她準備素便當。

她是東勢的客家人，從小唸書都是走山路，赤著腳要跑一個多鐘頭呢！她爸爸德亮公為私塾老師，從廣東梅縣來臺，頗有文才。德亮公逝世的時候，家裡習俗要用葷食，她主張用素的，大家聽她的，七中都吃了素，滿七那一天應該也吃素，但她的四姐卻買了一籃田螺，放在鍋子裡，還沒有燒，被她發



與慧心於靜宜女子學院畢業時合影

現，她很調皮，就去撿了一些石卵子，把那些田螺拿到臺中公園去放了生，一鍋的石卵在那裡燒，她姐姐想可以開葷了，但打開一看，哇！變了一鍋的石卵，心想一定是這個小妹調皮，但也拿她沒辦法。她那時候已經跟我訂婚，她比我小三歲。她過去跟大哥學過裁縫，後來去臺北的補校完成中學學業，考了一個同等學歷資格，才能考入大學。

我太太的英文很好，她跟靜宜的老姆姆（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同仁常稱她為蓋夏姆姆）在自由路辦英

文補習班的時候學的，她懂英文，對我幫助很大。她裁縫專做女子洋裝，原本是她哥哥和日本嫂子開的店，她哥哥、嫂子在光復以後去了日本，就將店面交給她，把全部工夫也都傳授給她。一日天主教修女多人，到她店裡要做衣服，見她年輕樸素就對她說：「你這麼老實的人，去我們那裡做修女吧？」她說：「我家裡媽媽信佛，我幫您做衣服少收點錢就是了。」修女又說：「那妳想學英文嗎？可以到我們那裡讀英文啊。」我內人知道修女們是自由路那家天主教專授英文的女子補習學校的老師，學校收費很貴的，她說：「念書很好呀，但聽說您們是收費很高的貴族學校，我是讀不起的。」的確，她們學生全體住校，生活上食宿享受都好，因此學費貴。學生大多是臺北來的富家千金。那位修女就說：「很多的女孩子在那裡學，學出來以後可以到美軍顧問團工作，收入也豐厚啊！如果妳去，我們不收妳的學費，只要妳肯幫我們教學生洋裁，如何設計、製圖和剪裁。我們也不給妳錢，妳來學也不收妳錢。這樣不是很好嗎？」

雙方說好後她就去了，下午放學後，晚上她又到我們圖書館的國語文補習班補習國語文，假日還去聽李老師講

經。她去唸書後，不久就學會了英文打字，在學校裡只能講英語，不准講中國話的，起先感覺很難，後來他們要求教洋裁也要用英語，她就努力學。後來她考靜宜女子學院，雖然數學沒考好，但是因為其他學科都好，所以也被錄取了。她很用功，夜校要讀五年，晚上弄到十點多鐘才回家，白天還幫我校對《菩提樹》。從靜宜到我們和平街的家有一段路程，她常以自行車代步。等到她畢業後，又去東峰國中教英文。因為她不是師專畢業，還要去補修教育學分。別的老師都幫人補習收費，所以學生家長也要求她補習，但她不肯為學生私下補課，常對學生說：「你真的學不好，我下課後免費教你，平時我為你們認真講課，你們也認真聽課，哪還需要什麼補習！」

她死於癌症，當她病得很嚴重的時候就請假，因為已經快接近退休年齡，就申請退休，她算是在病中退休。退休以後就專心治病，卻遭誤診。最早在中山醫院，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就讓她在病床上做腰部牽引，本來我已跟附近的一家素菜館都講好了，準備天天陪她去素菜館吃飯，結果一牽引，人就不能下床了。牽引好像一個石頭吊著身體。我也弄不懂醫師為什麼要為她牽引？X光片

都照了，但醫師看不出來，他們誤診了。

後來轉院，癌細胞已經在骨髓蔓延開了，中國醫藥學院也住過，也沒有辦法，轉到榮總才發現，榮總醫生很好，說要化療，在還沒有化療前，我們不敢跟她講，她膽子大，對醫師說：「醫生，你跟我講好了，我是佛教徒不怕死的！」醫生才老實告訴她：「化療就是要治你的癌症。」她知道後就不想再治療，說：「我要回家了。」

有一次，我帶她去看一個專門治癌症的中醫師，但也沒有用，他的漢藥一大包一大包的，為了放這些煎好的藥，就買了一個大冰箱，冰箱裡放滿了液體的漢藥，幾十袋，一天一袋，要吃的時候再加熱。

她一心念佛，自己拚命念佛，只有念佛，沒有其他辦法了，痛歸痛，痛就打針。她們結拜十姐妹中的八姐就說，多打止痛針不好！不要再打了，試著給她打一支補針，她也不會知道。內人的好友廖玉嬌居士，從國外回來，就來照顧她，聽了八姐的話，幫她打了一支補針，結果痛得更厲害，不能打補針的啊，打了補針，細菌更活躍了。我心裡很難過，人家也是好意，只好仍為她打止痛的嗎啡針。後來到臨終前兩天，她

也不要打針了，似乎已知往生時至，就不喊痛也不講一句話，只一直念佛。最後一天，我們附近住的幾家，也都是蓮友，就請蓮友黃潔怡師姐和她先生過來念佛，她睡了，在熟睡中往生的，已沒有一點痛苦。後來蓮社的助念團也來了，大家為她助念了八小時，另有一位密教的孔達喇嘛，從臺南趕來臺中，為她修「頗瓦法」，她也修學過此法，頗瓦法是密教的往生極樂淨土法。

她很幸運，生病時有三位仁波切，都是大寶法王的大弟子，來跟她加持，有的在醫院裡為她加持，有的在家裡給她修法，有一位在臺北，遙控幫她加持。加持的那天，她都不痛，但過一天又不行了，當天都有效，業力同佛力似乎在鬥爭，可能定業勝過了加持力，不是加持的佛力無效，所以只是短暫的一天見效，還是敵不過這個定業。夏瑪仁波切是她的根本上師，他是密宗噶瑪噶舉大寶法王首席攝政的弟子。他遠在尼泊爾就知道內人往生了，曾打電話給臺北一個喇嘛，說：「你去問是不是朱某人的同修往生了？」電話來問，我說：「對啊！」我就自己打電話去問仁波切，他說：「她已去了阿彌陀佛那裡。」因為他講英文，我聽不清楚，但這句話我懂。我找了一位住在臺南的中

國蘇南喇嘛，他過去修顯教的時候，我跟他就是好朋友，他曾幫《菩提樹》翻譯過文章，英文很好，我說：「你再幫我打個電話去問夏瑪仁波切求證一下。」不久他就來電說：「尊夫人已到他師父那裡去過了。」同時也證明師父說的，她已確實往生阿彌陀佛那裡了。

她死的時候才67歲，她對我的一生幫助很大。我辦雜誌期間，我不在家，就由她照顧一切。可是人生無常啊！譬如說我每次因公出國，她都在家裡為我作大放生，買了一卡車的魚蝦等物，到彰化的大肚溪去放生。我平日也常放生，因此我在外面都沒生病，有一次她沒有放生，奇怪我就病了。你看這個能叫人不信嗎？她都把放生功德迴向祈禱我一路平安，她這一片慈悲關切的心意，令人永難忘懷！

她是佛教徒，很慈悲很虔誠的佛教徒。她往生以後，我少了一個得力的助手。她勸我把《菩提樹》放下，找個適當的人交給他。因為我私人辦的東西，交出去也很難，我想出家人都有出家人的事業，他們是不會願意接手的。居士呢，他沒有一個後台，經濟能夠維持嗎？很多居士想要，我不敢交，交給他辦，沒經濟支持就完了。

我這個雜誌就是這樣撐下來，太太的幫助很大。我太太往生以後，燒出五百多顆舍利子，因為她非常用功。她得了癌症，但一點都不怕，醫生都不敢對她講，只找到邊上去講，她說：「用不著，我不怕死！直接跟我講就好。」生死本來就是沒辦法的。

我太太學密，也很用功，她修四加行之大禮拜，已修滿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大頭，其用功之勤，毅力之強，我自嘆不如！早期她在靈山寺參加雪公李老師開示的佛七，七天回家後，她說：「你不要碰我！我已經得了道！」她用功過度，據說七天七夜不睡，似乎有點著魔，我急請李老師來，叫她放鬆、放鬆、再放鬆，這樣子一個禮拜下來才恢復正常。這是用功過度，好像彈琴的人，弦張得太緊了，線就會斷，鬆了又沒有力，我們一般都太鬆。打佛七的時候，他們叫我拿一支拂塵，負責糾察，巡察修行者如有昏沉欲睡的情況時，在他面前虛晃一下。

十二、《菩提樹》的經費問題

《菩提樹》的經費來源沒有問題，後來經費是源源而來，因為書多，流通以後銷路不錯，我們有37種叢書，透過香港佛經流通處到國外，國外的錢都相

對的滙進來，我們還買香港的佛書來這裡流通，在買賣的過程中就能賺錢。香港佛經流通處由嚴寬祐居士伉儷主持。我們也流通港版的佛像。我每次要到國外，就先到香港結帳，嚴夫人把帳目都保管的好好的，清單開給我看，還剩多少錢，因為我到國外需要用錢，就從帳裡支取一些。而且我跟大陸的親人從來沒有斷過聯繫，經常給我媽媽寄錢，都是從香港轉過去的。在還沒有開放探親之前，香港人是屬於僑胞，僑胞在大陸的親屬叫僑戶，在大陸對僑戶有優惠，可以買到一般人買不到的東西。

香港的嚴寬祐居士非常了不起，現在香港與諸同道成立了一個福利基金會，一年中做的功德更多，如在大陸偏僻地區，沒有學校的地方，他去創設學校，並以捐款人的名字為學校命名，以茲紀念，中學或小學都有。他又在貧寒的地區布施寒衣給出家人，每年出版一本年刊，報導每年的業績徵信。

嚴居士以前除在香港主持佛經流通處外，還兼經商作為其資生行業。大陸文革期間佛教遭遇浩劫，所有法寶除被當場焚毀外，亦有事後送往紙廠作為紙漿回爐造紙者，嚴居士獲悉後為了搶救法寶，委託中共駐港人員向大陸覓求這批將充作紙漿的佛經典藉，作為出口

物資售給他的流通處。此時大陸在經濟掛帥的原則下，每月分批運到香港，價格以每公噸計，用麻布袋包裝，但其中混雜其他印刷物，有時每一麻袋中只有一、二本佛典；有時卻整個麻袋中都是善本珍典，甚至有明版南藏、北藏，只可惜零散不齊。嚴居士伉儷為整理這批散本的佛經，煞費工夫。然為挽救法寶，雖苦亦樂意去作。他們把整理好的法寶典籍，凡不同版本者都保留下來，重複多本者，多送到臺灣、南洋各地或在香港訂價流通，不但保存了法寶，使其流傳於海外，而且流通處之經濟基礎，亦因此逐漸建立穩固。我曾到他香港家裡參觀過，連牆壁裡面都有藏書，外面看不到，都是絕版的典籍，不得了啊！

他後來去了美國，現在又回到香港。在他離開香港的時候，曾寫信給我，說想要把家裡的一部分法寶，多是絕版的線裝經典，寄存在臺灣的佛教圖書館，問我臺灣有沒有較好的圖書館，可以寄放他的這些珍籍。那時候我們臺中辦的慈光圖書館地方太小，也沒辦法保管這些珍品。正巧我去美國，紐約沈家楨先生要辦一個紀念他夫人的圖書館。我就借這個機會，寫信告訴他，他要我代為聯絡。雙方歡喜，這一部分絕版的好書，就以一個貨櫃從香港海運到

紐約，寄放在和如紀念圖書館裡，貨櫃是由香港前特首董建華（董浩雲之子）的海運公司，免費幫他運去的。這批書在那裡寄存十幾年了，因為在山上住眾不多，利用率不大，嚴居士要收回，另行贈與佛光山，但紐約那邊圖書館執事者不允，且要索取保管、整理等費用若干萬美元，嚴居士自然也不答應，佛光山紐約道場負責人依恆法師曾到山上，要我陪同見沈居士，家楨兄已當面允諾歸還。但當佛光山派人取書時，館方忽又生變。終於雙方訴諸於法。打官司要有證據，當初沈居士和嚴居士往返連絡寄存的信件都是物證，圖書館的代理律師要訪問我，被我內人以我年邁又不懂外語而拒，事實上嚴、沈兩人皆我好友，左右為難啊！最後沈居士世緣已盡，往生佛國前，他的公子繼任了圖書館的董事長（和如圖書館不屬於美國佛教會，是另一法人團體，董事多為其家族）。現在聽說問題已解決了，因為紐約有一個大學正要接受和如紀念圖書館的全部圖書，沈公子已把這一部分珍品，無條件地「完璧歸趙」還了嚴居士，轉贈與佛光山。其他的書還很多，尤其是藏文的書也多珍品，多係張澄基博士捐贈的，現在全部給了此一紐約大學的圖書館，使利用的價值大大的提

升，豈不也是一件好事呢。

佛光山是在高雄的大樹鄉，所以這些書大概早已送來臺灣了。

嚴居士是我的好友，他本名祜邦，寬祜是皈依虛雲老和尚取的法名。在港時幫我們《菩提樹》代理流通，整理收支帳目，清清楚楚。這是他夫婦倆對友好絕對負責的一貫作風。後來，他移民赴美在德州休士頓協助永惺、淨海等法師成立德州佛教會。興建玉佛寺，捐輸淨財，不遺餘力，不求名位。像這樣熱衷、虔誠，發心獻身佛教的白衣居士，世間少有。

《菩提樹》發行的地區除本省外，世界各國以東南亞各國較多，其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大多有《菩提樹》的讀者，本省則以臺北最多，臺南、臺中，高雄也不少，東部較少。那時候寄刊到印尼去，因為他們非常排華，華文的書刊都寄不進去，但印尼也有我們的作者和讀者。我們要寄給他們真不容易，要把雜誌拆開來當航空信掛號付郵，才能收到，因此花的郵費也特別多。

我一向和海外的讀者有良好的聯繫，因此辦菩提醫院時，就是靠海外讀者的支援，才辦起來的。我跟白聖老法師、星雲大師等幾個人一起出國訪問六



在臺中車站為林李傳新女士送行

國一地區，我是隨團的攝影記者，雖然並不是去化緣的，但因為我在雜誌上發表了很多要辦菩提醫院的消息在前，於是海外讀者見了我，都自動地捐款。當時，每間病房三百塊美金。辦醫院消息早已宣揚出去了，到哪裡都有人拿錢給我，托我帶回捐建病房，海外各國《菩提樹》讀者很多，而且之前我已出國訪問多次，人有見面之情緣，東南亞華人佛教師友，紛紛響應捐建紀念病房，如新加坡畢俊輝師姐，她一人就捐建了兩間紀念病室，最令人感動的是美國夏威夷有一位並不富裕的林李傳新老太太，她一個人就代我們勸募了十幾間病房，都是好幾人合捐一間的。不知要費多少唇舌，而且其中還有分期付款的，真是

精神可嘉呀！她還單獨一人，帶了鉅款親自從夏威夷來到臺灣交錢，她也參加了菩提醫院的開幕典禮。

《菩提樹》是用訂閱的，從開頭就用訂閱的方式發行，我們雜誌的經費，從不透過化緣方式取得，那就只好請大家訂閱了，開頭只有十塊錢訂閱一年。因為臺灣的佛教雜誌幾乎都是贈送的，那經費就得靠讀者樂捐。我們是在家居士辦的刊物，所以我要破例獨立、不化緣，雖然如此，你若自動捐款，我們亦不拒收。但後來我訂了個辦法，若捐款用來訂閱刊物，贈送給大專社團、機關學校、一般中學的圖書館，或者是慈善團體，我們是歡迎的。



印度總理尼赫魯（左）接見中國佛教會訪問團

開始不是用這種方式，後來因為經濟感覺困難，才改變方式，開放捐款訂贈，經濟就比較活絡些，那時候十塊錢，訂價並不算高，像《佛陀畫傳》等叢書大概一本只要五、六塊錢。後來再版時隨紙價的調整，定價也隨時調整。

十三、由海外參訪談到星雲大師

前面提到我有一次出國，原定要訪問越南的，但因當時越僧自焚的事件，而只在機場稍作逗留，未敢進入西貢市區訪問。後來時局安定，又因華僧超塵法師的龍華寺落成，我隨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去參加開光大典，終於訪問了越南。那時候是由越南高僧心珠法師等在機場歡迎我們，信徒們都跪在出口的兩邊，很隆重地迎接本團，令人深深地感

動。越南那邊是南傳佛教，但也有北傳的，比較複雜。佛教以印度為中心，向北（中、日、韓）傳的是大乘佛教，向東南方傳的是小乘佛教。

新加坡佛教以華僧最多，但也有少數錫蘭籍的南傳比丘，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當地的馬來族人是不能信異教的，因此全國人民都信回教。但據說在吉隆坡有一個馬來人信奉佛教，因為當地有一座泰國佛寺，是泰王為泰國僑民所建的，住持泰寺的比丘是馬來人，他是因為外交的關係，特准信奉佛教的。至於當地的華人，當以信仰佛教者為多。

泰王是一位慈悲愛民的佛教徒，他也曾按泰國的慣例，短期出家一次，也同一般人民出家一樣要象徵性地去托鉢一次。泰王的女兒非常樸素、心地又非常善良，而且深通佛法；泰王的右眼失明，所以為他照相的人，都知道要從他正常的左眼這邊拍攝。

我們去印度訪問時，也受到當地華僑的熱烈歡迎，加爾各答的僑胞，歡迎盛況尤甚，因為那時候印度與中共雖已建交，但以邊境問題失睦，關係緊張，印度把加城華僑限制在某一些區域內活動，加爾各答許多地區華僑不能隨便出入，像我們到達加城機場時，有許多當



中國佛教會訪問團登臨靈鷲山佛陀說法台

地華僑都不能進入機場，只能遠遠地揮手示意來歡迎我們，因為機場也是禁區。

到了那裡，有三位僑領的引導，進入加市市區，華僑協會主席葉幹中和譚銳榮、鄧崇銘三人陪我們去朝聖，並去謁見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尼赫魯接見我們後，照片登上報紙，造成一場轟動，報紙發布的那天，正是離開印度的前晚，我們住的那一家五星級酒店，包著紅布頭的印度門衛，還用一口上海話給我打招呼，說他曾在上海巡捕房執勤。當天晚上，能容納三十多人的大會客室，就作為訪問團招待新聞記者的地方，我們把來印朝聖和尼赫魯接見的經過告訴了記者，當時因為行程緊湊，我們當晚就離開了印度，半夜裡頭坐飛機回

到泰京曼谷，所以在酒店只睡了三小時。

後來我們到了曼谷，才知道次日報紙發表新聞後，中共很反感，一再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的抗議！

我們在印度的行程不長，但應朝禮的聖蹟都去了，還到印度國父甘地的陵墓獻花。在德里大學執教的華人楊允元教授伉儷，是一對虔誠的佛教徒，聽說我們在印度飲食不便，一定要請我們吃一次素菜，一番盛意無法推辭，因大家久已未吃麵食，希望他們下麵招待我們，結果他們還是做了好多素菜，有麵有飯吃得非常痛快！飯後的印度甜點含有牛乳的味道，別人都不敢吃卻最合我的口味。我們在各地參禮聖地時，因為未雇導遊，一切尚算順利，只有靈鷲山

很不容易找。靈鷲山就是釋迦佛說《法華經》的聖地，我們身在靈山下兜圈子，卻找不到靈山，後來我在一家小店中發現了靈山的畫片，依照店員指點的登山路徑，才能如願以償登上了靈鷲山。真是身在靈山中，卻不知靈山在那裡？

那時候我身體尚很健康，還能登山，只有星雲法師跟我兩人跑得最快，彎著腰一路往上爬去，到了半山，才看到那個靈鷲山的模樣跟畫片上一模一樣，看得心頭激動，我把頭上戴的草帽一摘，拜倒在半山地上就磕頭，星雲法師也在那裡拜，我一時竟悲從中來，忽然大哭起來，星雲法師急問我：「朱居士你怎麼了？」我一時也說不上來，後來才說，我心裡頭一時悲欣交集，為什麼不在二千多年前就來到這裡？要是那時候來了，也不至於沉淪到今日，一堆山土，空蕩蕩地什麼都沒有了，佛陀的說法台尚在，但已看不到說法人了！佛陀在哪裡呢？

白聖長老因為稍胖，走得慢，晚點才上來，最後大家都跑到山上。如果是現在，我的腰椎已行不得也，就連這一堆山土也見不到了！因此我奉勸讀者：能修行就趁早，要參訪就不要遲疑，歲月是不饒人的！

我和星雲法師，就在此行一個多

月中，相處得很投緣，我們兩個一路上有說有笑，早期星雲法師對我有些誤解，後來他去開發宜蘭道場，在一次訪談中，我倆在榻榻米的小室裡，竟夜長談，互相瞭解很多。他之為人比較會替人家著想，不像一般人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出國在外，應該是同舟共濟，大家要互相照顧幫助的。後來他發展自己的道場較忙，若跟別人合不起來，怎麼發展？他口才、文才都好，能講、能說、能寫，在國內、外成立許多的道場，統理大眾很有辦法。佛光山每一處道場的職事，經常輪流交換，不讓你長住一個地方，使大家都有發揮的空間，也能發展各人專長。這些都是我所欽佩的！

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心胸廣大，所謂量大福大，事情做得也都很大；心量小的人，只執著自己意見的人，不容易發展。那個時候的環境，發展不容易啊，現在發展就比較容易多了，現在發展沒有什麼稀奇，大家都有錢，人家捐到慈濟功德會的，一筆捐款都是上億的，不再只是上千上萬元而已，千萬元已沒有什麼稀奇了。

星雲大師是近年來臺灣佛教發展主要的推動者，臺灣三代信佛的吳伯雄和香港的嚴寬祐，都是他的大護法。他自己很會想點子，他剛到宜蘭發展的時

候，我去訪問他，我們兩個睡在榻榻米上（那個時代只有榻榻米），談了一個晚上，他問我有關臺中蓮社的情形，我說那裡有很多的念佛班，每一個班幾十個人，也有十幾個人的，譬如說我那時住在復興路，負責領導都是外省籍的復興班。每一個月都要輪流開班，有佛學問答，讓班員提問，老師主答，積了幾次，就在《菩提樹》上發表，否則《菩提樹》那麼多問題哪裡來呢？最初問題都是我或李老師自己提問自己答。

李炳南老居士比星雲更早去宜蘭，在星雲還沒有到宜蘭之前，他就在那裡講經弘法。我是跟老師一起去的，當地有個林松年居士，帶頭歡迎我們去，後來中國佛教會擬向澎湖與宜蘭兩地弘法，就找了星雲與廣慈兩個年輕有為的出家法師，說：「你們一個去澎湖，一個去宜蘭，哪個願意去宜蘭？哪個願意去澎湖？」後來星雲去了宜蘭。他到宜蘭後，很快就在宜蘭發展起來。他現在這些大弟子都是出身宜蘭的。早期的如慈莊、慈惠、慈容等，都是慈字輩的皈依弟子！還有一個慈什麼的名字我已忘了，可惜已經往生了，她很會辦幼稚園，佛光山開山後她又主持孤兒院，辦得非常成功。他們都各有所長。我認識慈莊的父親，慈惠的弟弟考上中市的農

學院時，還叫我為他做保證人，都是很熟悉的。後來東初法師倡印《大藏經》時，他們組織了宣傳小組，到臺中時，我們也全力協助，臺中一個地方就預訂了五十多部，都因李老師登高一呼。我們假靈山寺請了十幾桌素席，宴請中市蓮友及各寺廟住持。吃飯的時候，李老師呼籲大家踴躍贊助，當場我拿了一支筆都來不及寫，你一部，我一部，他一部，就這樣登記，全省各地，連臺北都沒有這麼多。慈惠為此事寫了一篇報導文字，附錄在《大藏經》上，也在我們雜誌上刊登。

他們在臺中時，我們代借家職講堂給他們安排會場，以備法師們開示講話，宜蘭的佛教歌詠隊表演歌唱。後來我內人往生時，星雲法師不知如何得到消息，因為我沒有通知任何法師，他們怎麼知道告別式的日子？但星雲法師和他的慈輩弟子們一早就來了，告別式還沒開始，慈莊、慈惠這幾位高徒，都是我們熟識的法師，他說：「你太太幫我們的忙很多。」大師是很重感情的人。我每次到臺北，經常在佛光山的別院下榻。他會交待下院的常住說：「朱斐居士為佛教辦佛事很忙，來來去去，你們要盡力招待。」因此我在臺北住幾天都可以，他們的道場還保留一間套房給

我，出入自由，也供應飲食，我都在那裡吃早餐，有時候不好意思，就默默地在他們的功德箱裡放一點錢進去。如當面供養，她們會說大師關照，不收供養。

星雲法師早期的皈依弟子在我辦雜誌時，適在中市慎齋堂接受幼兒教育培訓，還利用假日來雜誌社幫我校對，這些女弟子做事很勤快，很認真，個個都是今日的弘法大將！

同樣的，他們宜蘭有事，例如念佛會幾週年紀念，我們蓮社也派一支口琴隊去共襄盛舉，念佛堂開幕典禮，我們也派口琴隊去演出，口琴隊共有十幾個人，由洪金龍教導吹奏佛教歌曲，全部是男青年，唯一較大年紀的就是我本人。我還在開幕典禮中展出海內、外佛教動態放大照片數十幀，星雲法師特向右鄰借用了一間房子給我們展出，來自臺北應邀出席的貴賓如章嘉大師、孫夫人張清揚居士等，他們都來參觀我們展出的照片，恰巧其中也有章嘉大師和孫夫人的大幅照片在內，他們看了都很歡喜。

十四、交出《菩提樹》雜誌以後

後來我遇到越南來的淨行法師，我看他很能吃苦，吃飯都是糙米放點芝麻，不吃菜。本來出家人到任何寺廟裡都可以掛單供膳留宿，他和德念法師是

從越南來臺讀大學的青年比丘，他們的校長曾一一拜託臺北的大寺照顧他們。後因戰事加劇與越南家鄉斷了聯繫，也沒有生活費用供應兩僧在臺的吃住。同來德念法師就每天到某寺去用齋，某寺眾冷言冷語地說：「吃飯的又來了！」他雖懂得，也只好笑笑忍著。本來叢林的規矩是十方來，十方去，應該是十方僧眾都可分享的。淨行法師無法忍受這些冷言冷語，就自己一個人煮糙米飯吃，他一頓飯要吃一個多鐘頭，慢慢的咀嚼，吃得很香，身體也很好。他會氣功，自己租了一個地下室以教氣功為生，教氣功的時候還常邀我去，他說：「你講佛法，我教氣功！」

我想這個人倒是可託以重任者，我的想法是：他有幾個皈依弟子，都是博士、碩士學位的青年，後來都跟他出了家，我想他手下有的是人才，後來更建立道場渡眾，也不愁世財了，如把雜誌交給他的話，必然能夠把菩提慧命延續下去，使菩提常青，不致有中斷之虞了。有廟不愁沒有經費，有學生不愁沒有人才，就交給他吧！可是事與願違，萬法無常啊！

有一次我去參加聖嚴法師辦的弘法活動，在回來的路上，恰巧碰到他和他的弟子，坐他們的車子回臺北。我就

將這個心意告訴淨行法師，他的徒弟都在旁邊說：「好啊！好啊！師父，你接啊！」但他起先猶豫似有難處。我講你們徒弟都勇敢地直下承當，還怕什麼？他才答應了。我把所有出版的叢書全部給他，起先是要算多少錢，打個對折，後來我索性全部贈與，送給他們了，並且還供養他一些錢，希望他能夠繼續辦下去。還找來中佛會秘書長了中法師等作證，並將這事情發表在兩份刊物上，就這樣子移交了，簡單舉行了一個儀式，在他那裡，請參與作證的人用了午齋。

我不是把《菩提樹》賣掉，而是送掉的，還貼了錢送出去，我希望他能夠繼續辦下去，不要中斷，長期的辦下去。但後來他的徒弟都不肯主持編務，他去找了一個臺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的教授來編，什麼人我記不得了。結果編得走樣了，還談到政治問題，我說我們佛教雜誌從來不談這些的。當時就有人問我：「你這雜誌怎麼改變了宗旨？」我說沒有啊！人家說有刊物為證。我就寫信告訴他，他就把主編者辭掉，自己再另找人，你編幾個月，他編幾個月，沒有能夠持續下去，他的徒弟後來也都散離他去。要是徒弟能夠承擔下來這個主編工作的話，到今天都不會停掉的，他辦了二、三年就停掉。他要

交還給我，但我人已經在美國了，我回來的時候他要交給我，我說現在我不行了，一方面我家已遷居美國，也沒有助手，同時現在印刷都是平版，需要用電腦打字，我現已年邁沒有辦法接手了。我沒收回，雜誌就壽終正寢，嗚呼哀哉！

現在又將復生了，但不是刊物復生，而是嘉義香光寺女眾道場辦的圖書館，他們看上了我這份雜誌，蒐集過去出版的雜誌，做掃描，製作成光碟。他們跟我訂了契約，我委託他們，無條件的把《菩提樹》從第一期到第四百四十四期的文稿，全部重現於光碟。時代不一樣了，出版的面貌也更新了。我滿懷高興，雜誌豈不等於是復活了？您說呢！